



■1939年7月,曹维廉(左)与妹曹维礼、弟曹维新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合影

光照后人行

忆维廉

● 张锐

我初次认识维廉同志是在1937年冬天,他随欧亚航空公司到达昆明之时。当年,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正在昆明蓬勃兴起,民众歌咏团、歌咏骨干训练班吸引着千百个青年。维廉同志一到达昆明,立即投身于歌咏运动,成为其中最活跃的组织者之一。那时,他22岁,由于他知识广博、为人持重,大家都尊称他为曹老师。

我和维廉同志无话不谈。我曾告诉他,从小跟随父亲学过胡琴,会拉京胡,能伴奏京剧。十一二岁时,家庭破产,比较贫困,一度曾被一批银行高级职员邀去当他们票戏时的京胡伴奏,几乎

因此而辍学。如果不因为母亲心疼我,卖了首饰给我做学费,我很可能早已“下海”当琴师了。他听后,直言不讳地说:“你决心离开那个圈子太好了。”他不能容忍旧社会有钱人以票戏为消闲、享乐,借捧场而玩弄、侮辱演员的丑恶社会风气。

维廉同志青年时代就是个音乐爱好者,他虽没有专修过音乐,但他十分理解并善于用音乐表达感情。他唱歌时,往往全身心投入到音乐中去,达到自我陶醉的程度。有一次,大家齐唱《松花江上》,很多人都流泪甚至失声痛哭,唯有他,沉默着、紧抿着嘴唇看着大家。他与大家一样被

歌声深深打动了,但他心中有更多的仇和愤。每次他指挥唱歌,都威严、挺拔地站在台上,动作果敢、利落、斩钉截铁。记得,他指挥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唱到“冒着敌人的炮火”这一句“炮火”两个字时,他双手握拳,左手一拳,右手一拳击向自己的胸膛。指挥《大刀进行曲》最后喊杀时,他用右手由上向下劈去,好似举起大刀砍向敌人。他用双手表达了致敌于死地的力量,他借音乐表达了众心同仇敌忾的气概。

维廉同志喜爱抒情而雄壮的音乐。这对我以后的音乐创作思想、美学观念、审美情趣无形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多年来,

我在音乐创作和二胡演奏方面始终追求内部蕴涵着力,既壮且美的音乐。

1938年他与任光先后去到新四军。我因组织上安排我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学音乐,直到1945年才辗转来到新四军。解放战争开始后,我们很少见面。记得徐州解放后,在徐州郊区见过一次面。那时,他在陈毅司令员身边做机要工作,他是掌握无线电报机技术的,他是陈老总的“耳目”。一般他不能离开岗位,我到他宿营的庄上去看他,我们畅谈了别后情况。他再三叮嘱我注意健康,要用音乐武器为人民多创作、多演奏,战争胜利已指日可待了。临分手时,他像个大哥似的赠给我两双线袜、一条毛巾及一些零花钱。东西虽少,但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,却是不易得到而又十分必需的。我感到他对我的贴心和关怀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听说维廉同志到了北京。我虽多次到北京,但往往又失之交臂,难得有机会与他见面,直到1973年在北京才又见到他。那时,他似乎是刚被“解放”出来。他因遭受“四人帮”迫害,腿已致残,走路有点不方便,但我看他依然精神焕发,他性格中的刚毅和锐敏有增无减。他举起一根拐杖给我看,乐呵呵地说:“陈老总知道我腿受伤了,把他用过的一根拐杖送给我,希

望它能帮助我走路。其实,我不习惯用拐杖,不过,这总是个有纪念意义的礼物啊!”1973年,那是个是非颠倒、黑白不分的混乱年代。“四人帮”横行霸道、垄断一切。他们在全国实行文化专制,把中国的、外国的所有优秀文化遗产都一概批倒了。维廉同志见了我还兴致勃勃地谈音乐,他直率地对我说:“我喜欢贝多芬的音乐,那才是真正的音乐。现在那些粗制滥造的标语、口号能算音乐吗?我还是愿意听听贝多芬的奏鸣曲、交响乐,它能给人以力量。”我欣慰地感到,他是无畏的,他决不随波逐流,他相信真理,敢于说出真理,他是压不垮、整不倒的。

有一年他到南京开会。一天,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,说:“我找了你好久,今天才得知你的新住址。你到我这里来吧!把你的歌曲《青年颂》带来。”我为这次重逢感到兴奋不已。当晚,带着《青年颂》的曲谱去见他。他一见到我立即热情地走过来挽着我,他风趣地对一屋子稟报工作的人说:“我们趁这机会休息一会儿吧!”然后匆匆地把我拉到一个小房间去谈话,并听我唱歌,显得异常亢奋。

《青年颂》是乔木的诗,1940年我在重庆时谱曲的。我曾唱给他听过,他特别喜欢这首歌。其中有这么一段词:“……我们是

五月太阳的儿女,我们是突破黑暗的先锋,生来就是黑暗的反叛,生命好,但光明更可爱……。在昆仑山的最高峰,在帕米尔的高原上,打起火把指点着东南,那是我们梦中的祖国,受尽损害摧残的人民,受尽践踏侮辱的江山……。青年们,没有功夫流泪,我们举起拳头宣誓,凭着头上的蔚蓝天,为你生,就决心为你死,死在你的怀中也甘愿……。我们的呐喊震摇山谷海洋,我们战斗永远不知疲倦,我们的力量能够翻转地球,要把今天的世界变成明天。”他看着歌谱,小声地跟我一起反复地唱,唱着唱着,像孩子般高兴地笑了起来。

这首歌是40多年前的作品,但他唱起来仍那么动情。这说明时光虽已流逝,但他的心依然是年轻的。他一生确在实践着这样的誓言:为突破黑暗、追求光明,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,乃至牺牲生命。他一生不知疲倦地工作,直至生命终结。他去世时的情景证实了他为人民、为祖国忠贞不渝的心。这天晚上分手时,我们突然相顾无言,恋恋不舍。回家后,我也是若有所失。可我绝没想到这次分别正是他对我的诀别。至今当我回忆起这次会面时,他的形象、他的歌声仍在激励着我。他活在我心灵深处。